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童 兵 / 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最新报告 (2011)

 复旦大学 出版社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最新报告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1)/童兵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309-08468-9

I. 中… II. 童… III. 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报告-中国-2011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474 号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1)

童 兵 主编

责任编辑/李 婷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23 字数 541 千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468-9/G·1025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屈指算来,从2006年编撰《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以来,本报告是第六部,梳理和报告2010年全国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概况和成果。从第一部开始,我确定编写报告的宗旨是:向人们鸟瞰式地展示过去一年中国(以大陆地区高校为主)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全貌,包括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主要研究领域,重要学术论文及观点,重要学术会议和公开出版的著作与教材。同时,作为“985”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主要学术成果之一,这部报告也是向国家和复旦大学“985”管理机构提交的一份工作报告。

2010年国内重大活动多,重大事件多,对这些活动和事件的新闻报道及评述也多。自然,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项目和学术成果也多。同时,由于传播科技的进一步发达和跨文化传播的继续繁荣,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也有不少新的领域、举措和学术上的进展。

2010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聚焦的热点有:

一、对重大新闻报道进行理论评点。从后金融危机到国民生产总值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上海世博会到广州亚运会,从青海玉树地震到甘肃舟曲泥石流等一系列特大事件的众多新闻报道,学者们集中关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二、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传媒的社会责任。过去这一年里,新闻传播学术界对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群体性事件及新闻报道继续保持高度关注,研究成果数量增多,研究主题和视角拓展。

三、新媒体传播研究。过去一年,学者们对新媒体这一“在发展中变得混杂和庞大”的复杂概念进行新的解读与界定,对新的传播技术革命对传播生态格局和市场版图的变革有了新的解释,对新媒体今后发展趋势有进一步展望。

四、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研究。学者们分析了中国舆论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新态势,从不同角度探讨提升新时期舆论引导能力的新境界。通过分析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特点与规律,研究公民公共资源分配制度改革和利益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式。对于微博舆情的引导策略,学者们也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五、媒介融合和“三网合一”研究。学者们认为媒介融合将引领产业链向横向延伸和纵向拓展,引领传媒产业从资源整合到产业重组,引领传媒产业与电信、文化产业融合。媒介融合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对媒介环境的依赖,影响人类自身健康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中国式的三网融合是在意识形态参与主导下的中国特色的融合,是要构建一个以媒介为高地,以内容、网络和服务为骨干基础的媒信产业。

六、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新闻学术界认为,在传媒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出路应为文化传播。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主要态势是:全球化、综合化、现代化、本土化。当前要下工夫提升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

七、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反思。自我反思是学术保持主体性和提升学术活力的基本功和重要途径。学者们评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院内发文”、“近亲繁殖”现象,分析较低的论文产出率及其原因,分析滥用或误用“范式”的做法及原因,指出传播学的边界及应克服的几个问题。

我们从发表于全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高校学报等期刊上查阅了上万篇论文,梳理了有代表性的观点,依新闻学、传播学、视听传播、媒介经营管理与出版四个方面排列,以便读者阅读与使用。四个方面又分别列出若干分题,由每位执笔者负责一个分题。作为主编,我首先考虑的是编撰的规范和统一,因此每人至少对自己负责的分题检查和修改两次以上,然后又分别由各副主编修改和把关,在此基础上我自己检阅一遍并对其中的一些篇章作必要的修改。作为执笔者老师,我又必须充分尊重每位执笔者的个性、学术爱好与写作特色,所以一些分题的检索和梳理,甚至编撰的局部内容,可能同另一些作者编写的内容或主题,有部分交叉。我只要求这些相关作者和相关内容尽量有所错位,但仍很难完全避免雷同。此外,各章节行文的风格以及详略取舍也不尽一致。所有这些,我实在不便动用“斧子”,只好请求读者理解和海谅了。

几十位作者检索了上万篇新闻传播学论文后发现,我在读完初稿后也有同感,2010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有一长处和一短处值得我们重视。长处是,过去一年有一些研究者对这些年来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不足有深刻的检讨和反思,这些检讨和反思还相当到位。希望这些章节的内容能引起读者、特别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关注,更期待我们的呼声和批评能够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切实起到一定的提醒甚至引领作用。短处是,过去这一年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尤其是新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给力很不够,产出的成果也不多。对一个基础性研究已经相当欠缺的学科,出现这种现象是费解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主管部门近年把学术关注与经费投入的重点放在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上,这当然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只是希望,同时也能够向一些基础性研究比较薄弱、积累不多的学科,比如新闻学类,给予一些政策的倾斜和较多经费的投入。对学者们来说,也应克服“近视眼”式的研究取向,不要只把眼光完全盯在给钱多的应用类项目上,也不要满足于“打快拳”的研究路径。这样下去,对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全体同学投入了这部报告的编撰工作。对年轻学子来说,这是一场“向科学的进军”。他们从2010年10月落实编写计划开始,收集、阅读和检索,每人阅读的相关论文大多在三四百篇以上,整个寒假也在工作,至2011年3月完成初稿,交由林溪声、王梅芳、姜华三位副主编作修改、订正和文稿规范的工作。在此期间,班长杨保达协助我做了许多组织工作。

为了保证文稿质量,同往年一样,提交给教育部社科司的总报告部分的初稿延请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丁柏铨教授审读。丁教授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读毕全文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这里,向丁教授表示诚挚的感谢。对他的一些建议的吸纳,已反映在我这篇前言之中。

张晓锋教授一如既往,提供了2010年国内召开的新闻传播学科重要学术会议概况和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类专著与教材概况。这里,也向这位荣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的年轻教授致以谢意。

特向始终支持这部报告编写的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诸位领导和朋友致谢。向参加本年度研究报告编撰工作的全体作者团队致谢。

在本报告付梓之际,作为主编的我仍内心不安,因为我国新闻学术期刊和高校学报太多,论文太多,作者太多,尽管我们作了“地毯式扫描”,仍难免疏漏少数学者的重要论文,对论文观点的提炼也未必精当。万一出现这类情况,由我本人负主要责任,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相关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童 兵

2011年6月18日

于复旦大学“985”新闻传播学研究基地

目 录

前言	童 兵 1
----	-------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11)	2
---------------------	---

第二部分 新 闻 学 研 究

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	38
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研究	46
外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研究	59
新闻实务研究	67
突发公共事件与群体性事件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78
舆论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90
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研究	104
新闻政策与新闻法规研究	114
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研究	124
新闻教育研究	131

第三部分 传 播 学 研 究

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	148
媒介融合研究	160
新媒体理论与实务研究	172
受众研究	188
危机传播研究	199
传播效果研究	209
广告研究	217
公共关系研究	230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239
媒介文化研究	249

第四部分 视听传播研究

广播研究	256
电视研究	266
新闻摄影研究	279
主持人研究	288

第五部分 媒介经营管理与出版

传媒经济学与媒介管理研究	298
新闻传播体制改革研究	308
文化产业研究	326
编辑出版研究	338
出版改革研究	356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11)

2010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学术研究十分活跃,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明显多于往年,研究热点集中,有一些学术重点研究深刻,一些学术见解富有新意,涌现出一批学术新秀。

一、学术研究聚焦的热点

2010年国内重大活动多,对这些活动的新闻报道多,相应的研究也多。全年新媒体技术及使用又有新的发展,对新媒体的研究继续成为热点。“三网合一”和媒介融合不断推进,多种见解发生碰撞。对自媒体、全媒体、微博的研究有新的拓展。对30多年传播学自引进到实行本土化的路径有了新的反思,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看法。在中央提升国际传播力的要求下,相应的理论研究顺势展开,成为这一年一个重要的热点。

1. 对热点新闻报道的理论评点

2010年新事、大事层出不穷。从后金融危机到国民生产总值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上海世博会到广州亚运会、从青海玉树地震到甘肃舟曲泥石流……对这一系列特大事件的规模巨大又影响深远的新闻报道,学者们进行了集中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2010年初胡锦涛对举办上海世博会提出了“六个确保”的要求,其中一个就是确保新闻宣传“有声有色”。宋超认为,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世博会是百年一遇的新闻传播实践的大课堂、大舞台,而对于新闻理论研究来说,它也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大课堂、大舞台,是新闻理论研究的一座“富矿”。世博会新闻宣传及媒体服务创新探索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催生的理念等,非常值得认真研究。他还建议从下列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世博会的新闻信息服务,世博会的媒体服务工作,世博会新闻传播效果对世博会运行工作的推动,世博会的舆情研判与舆论引导的关系^①。童兵、黄奇萃认为,世博报道忠实呈现了世博会盛况,营造出和平环境,体现了世博外交的成功。世博报道呈现出如下特色:媒体的信息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注重普通人、平凡人的报道;突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综合类世界博览会;利用各种途径与受众互动^②。邓绍根、马庆认为,世博会报道不断增强报道的连续性、时效性、心理的和地理的接近性等特点,集中体现了注重新闻价值,回归新闻本位,尊重新闻规律^③。

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整体实力的体现,利用体育赛事传播城市形象,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夏宝君认为,广州市作为第十六届亚运会的举办城市,注意结合亚运文化与城市文明,倡导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重视媒体的作用,讲究传播策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传播广州的城市形象^④。在

① 参见宋超:《开掘“世博”传播这座富矿》,《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

② 参见童兵、黄奇萃:《上海传媒世博报道百日评点》,《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

③ 参见邓绍根、马庆:《新中国60年世博会报道风云——以人民日报对历届世博会报道为例》,《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8期。

④ 参见夏宝君:《基于城市形象建构下的体育赛事传播策略——以2010年广州亚运会为例》,《新闻界》2010年第5期。

信息传播多元化、全球化,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现实语境下,城市形象对外传播需要借力于节事活动的助推。何国平、王瑞应等认为,举办体育赛事,尤其是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在彰显城市软实力的同时,也为优化、推进城市形象传播搭建了有效平台。也有学者指出,在举办这些大型活动中,从官方到民间,上海和广州这两座城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舆论生态,从中或许可以折射出两地舆论管理机构不同的思路。虽然上海的经济实力雄厚,但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同广州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①。

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后,“青海地震”迅速成为网上最热的话题,但当网友想从地震发生地的电视台青海卫视了解最新信息和现场实况时,却发现青海卫视正在播出偶像剧,没有播放任何同地震有关的信息。赵华认为,在危机频发的社会环境中,地方电视媒体需明确自身的功能,通过恰当途径实现电视媒体全功能的重构,以更好地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②。如果说2008年的“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为检验标准的,那么,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报道则是以汶川大地震报道为参照的。汶川大地震报道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及时性、透明性和人文性,实现了媒体话语机制的历史性跨越。赵振宇、胡沈明认为,从此灾难报道进入了新的时期——后灾难报道时期,此时信息公开不再是问题,全面报道不再是问题,“第一时间”也不再是问题。媒体在报道灾难、传递信息时,处理信息与传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成了主要的问题。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从批判他者逐渐变为批判自己,探讨自身与他者的关系成为灾难报道的主题^③。刘玉松认为,处理重大灾难性新闻,媒体的“个性特质”是决定其在这场新闻战中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过犹不及,在处理灾难事件新闻时,也不能一味强调“个性”。因为灾难事件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主要特点,从根本上说,它终归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我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时刻铭记媒体的责任,在编排稿件的过程中应注意其应有的积极传播效果^④。王晶红、胡小锋认为,当前国内地震灾害新闻报道应该强调信息科学的功能性取向,这种功能性取向应该成为新闻工作法则体现于新闻工作实践。其中包括:第一,以受众为主体提供新闻内容,并使信息更加量化、翔实。第二,进一步核实信息源,避免误导受众。第三,新闻信息发布要考虑信息的相关性,利用信息科学进行媒介协同与救援协同。第四,进行有效的新闻发布与政府危机公关,避免多部门之间职责的分立,考虑信息发布中的协同。第五,采取复合新闻伦理的报道方式,强调与民众的对话^⑤。

2.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传媒的社会责任

2010年,新闻传播学界对突发公共事件和突发群体性事件新闻报道继续保持高度关注,研究成果数量呈上升趋势,研究内容和主题进一步拓展。这一年,虽没出现过去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等举国震惊的特大群体事件,媒体也较少出现前一年杭州“欺实马”(70码)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异常活跃的姿态,但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南平校园惨案、富士康员工跳楼和各类强

① 参见周筱赟:《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

② 参见赵华:《危机报道下地方电视媒体的功能——以青海卫视玉树地震报道为例》,《新闻世界》2010年第8期。

③ 参见赵振宇、胡沈明:《玉树地震:中国进入后灾难报道时期》,《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5期。

④ 参见刘玉松:《在重大灾难新闻报道中打出个性牌——以“青海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报道为例》,《新闻世界》2010年第12期。

⑤ 参见王晶红、胡小锋:《试析玉树地震72小时灾难报道与危机传播特点》,《新闻记者》2010年第7期。

拆事件中,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已成为传媒的重要亮点,成为提高传媒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和突发群体性事件新闻报道和影响舆论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中,微博已成为传统媒体之外第一载体。据统计,在2010年舆论关注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11起,比重约占22%^①。微博依托各种人际关系的信息传播,可以使偏于一隅的事件,经过网民及时传播和“情感发酵”,引发舆论风暴,在短时间内集中浩大声势,成为举国关注的重大突发事件。在宜黄强拆自焚、方舟子遭锤击等事件中,当事人、事件目击者的微博成为最早的新闻源头。微博既充当了信息发布的平台,又展示出自媒体的属性。

危机伴风险共生,自由与责任并重。对风险社会的强烈感知和传媒使命的自觉意识,推动着新闻传播学界进行理论反思。有学者指出,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要树立“务实、责任、风险”三个意识。信息的公开、准确、及时、权威是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条件,确保信息公开并在第一时间传播是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的基础性环节^②。在经历近几年许多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洗礼之后,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已开始走向常规化。我们在此问题上已形成共识性理念,这就是: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主动权。

学者们对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原因的探寻体现了新闻传播学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童兵认为,当今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和突发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原因大致有四个:一是人为的掠夺性开发导致生态环境不断破坏;二是制度设计不合理,社会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社会冲突和社会纠纷得不到切实解决;四是突发公共事件和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公开不够,传媒的情绪宣泄功能未能受到重视并在社会生活中付诸实施^③。他还统计了近几年中国突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及数量,认为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社会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他指出,人类在经历了一个敌对的世界后正在迈入一个危机和风险的社会,在这样的情势下,“风险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常常取代如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相联系的不平等之类的变量。它更强调风险的新的权力博弈和它的元标准”^④。有学者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从当今世界秩序和社会发展来看,风险社会对于人的主体发展和社会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风险社会使得人们生活和发展压力加大,个体紧张度增强;第二,风险社会使得人们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加大,使安全和信任的成本加大;第三,风险社会的存在,打破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⑤。

突发公共事件与突发群体性事件通常伴随着舆论的密集涌动,而舆论源于社会自身的变动,体现着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在中国,媒介化社会的形成与社会转型的过程具有时间上的耦合性。随着“新意见阶层”的出现,从舆论表达主体的变化审视突发公共事件的多发与频发不失为一个独到的视角。张涛甫提出,当代中国社会语境在社会舆论层面的表现,是社会舆论十分活跃,舆论战争硝烟不散,舆论风暴时有发生。舆论场作为社会话语场域,充满了利益、权力的纠葛。舆论场域中的表达主

① 参见姜泓冰:《逾1.2亿人用微博》,《人民日报》2010年12月30日。

② 参见蒋蕾:《危机伴风险共生 自由与责任并重——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10年第10期。

③ 参见童兵:《简论新闻传媒的宣泄功能》,《新闻记者》2010年第2期。

④ 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⑤ 参见唐洪玉:《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媒体社会责任探析》,《新闻世界》2010年第2期。

体之间的差异很大,一些社会态度值得关注,仇富、仇官、仇警、民粹心理等,这些社会态度成为诸多舆论事件的燃料,一经引爆,会产生巨大的舆论风暴^①。

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常规新闻报道在原则、立意、框架和操作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张国平认为,恐慌事件中新闻处理的基本原则是快速反应与紧张有序相结合,连续客观报道与专家权威分析相结合,安抚群众与正面引导舆论相结合,满足公众知情权与保守国家机密相结合^②。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基本原则的讨论大量集中于时间节奏的把握问题上,这展现了学界对传媒各类报道实践的效果反思,呈现了对特定类型新闻报道中时效性理解的深化。崔以琳认为,“快”与“慎”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快”不等于“不慎”,不能为了抢发新闻而乱下结论,肆意扩大或缩小新闻事实;“慎”并不意味着“不快”,待结果明朗后再及时报道也是一种快。突发事件是在发展的,其原因也是在动态中逐步清晰的,只有尊重客观事实,尊重新闻规律,才能把握“快”中有“慎”,“慎”中求“快”的辩证关系^③。

3. 新媒体传播研究

新媒体这一复杂概念在发展中变得混杂和庞大。金兼斌认为,新媒体本身并非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是与时俱进的。现阶段,以互联网、手机、各种户外电子媒体等为内容传输和显示终端的媒体,都可以称为新媒体。苏林森认为,当今新媒体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和移动化。基于网络化和移动化特征的各种媒体和媒体组合都可以视为新媒体^④。詹睿认为,新媒体作为与传统媒介相对应的概念和事物,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迅速,其形态也呈现出丰富多彩、融合吸纳的局面,既保持双向传播的本色,为受众提供舆论场;也更长于娱乐休闲平台和人际关系网络的搭建,开辟了当下生活的重要空间,可划分为以下四种形态: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互动性电视媒体和新型媒体群等^⑤。

喻国明指出,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领域的生态格局和市场版图,传统媒介在未来发展中的角色扮演和价值落点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媒介应该成为公民新闻运动中的信息节点,整合、组织、策划和利用公民新闻运动所产生的信息蓝海。第二,传统媒介应该成为纷繁信息的统合者和权威意见的提供者,从各种信息和现象中鉴别出最重要的事实和信息,减省人们把握世界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在发挥“议程设置”、“框架效应”以及“情绪启动”功能中占有十分明确的优势地位。第三,传统媒介应该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构建者,担当起社会利益、社会意见和社会情绪平衡者的角色,在各种圈子和部落之间建立一种信息沟通、彼此认知的公共平台^⑥。

熊澄宇等认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新的媒体技术和媒介形式不断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传媒改革的步伐:使大众参与到社会制度的建构当中,促进了媒介制度的建设;改变了传统媒介的微观形态、产业结构、商业模式和经营思路,推动了传媒产业快速发展;重塑了个体意识,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全球化进程,从而影响着社会形态的整体变化;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进一步释放了文化活力。总体而言,新媒体不仅仅是一

① 参见张涛甫:《试论当代中国的舆论表达主体》,《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张国平:《论群体恐慌事件的新闻处理——以乌鲁木齐针刺事件为例》,《新闻爱好者》2010 年第 5 期。

③ 参见崔以琳:《“快报事实,慎报原因”:突发事件报道的良策》,《新闻记者》2010 年第 5 期。

④ 参见金兼斌等:《重新认识新媒体》,《互联网天地》2010 年第 8 期。

⑤ 参见詹睿:《浅析新媒体形态》,《新闻传播》2010 年第 4 期。

⑥ 参见喻国明:《新型传播方式的崛起与传统媒介的价值落点》,《新闻与写作》2010 年第 7 期。

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正是由于这种技术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交替,而在一个层面推动了国家的技术、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前进;传媒改革的实质便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①。

李慎明认为新媒体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在经济领域,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产业革命,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国际资本的竞争重地。据统计,从1994年到2010年的16年中,中国信息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6.6%,信息产业发展速度快,经济规模跃居全国工业之首,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和先导性产业。在政治领域,新媒体极大拓宽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网络竞选、网络问政、新媒体执政等日益成为热点,新媒体深刻地改变着政党的执政方式和人民大众的参政议政形式。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方面,新媒体也无疑促进和加强了我国安全工作、军事及技术方面的变革。在社会文化方面,新媒体给人们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平台,多样而强势的网络社会文化,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方便,丰富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在新闻传播领域,依托于网络信息技术而勃兴的新媒体,在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上具有崭新的特征,在发展规模、传播功能等方面后来居上,呈现出融合和超越传统媒体的可喜现象,拓展了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带来了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②。

胡泳认为,要想让网络空间成为识别、表达甚至解决公共问题的场所,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营造社区的归属感;灵活地决定匿名政策;保持平等;鼓励慎议;培育良好的公共话语^③。胡茵茵通过总结分析网易新闻跟帖业务,认为尽管网络媒体自身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但由于商业利益驱动的存在,它仍然会成为建构公共领域的天然支持者^④。宋石男认为,新媒体提供了平等、多元的话语平台,使公共领域呈现出向所有人、所有问题开放的趋势,“受众”转为“公众”,网络也转为“共有媒体”,公共性得以回归。在中国这种既于过去缺乏公共领域传统,也于当今匮乏公共领域实践的国家,互联网几乎成为民众抑制信息垄断、大声表达的唯一渠道。其中,网络意见领袖影响公共话题、推进公共事务的能力还相对有限,但已经逐步显示出民众通过自有或共有媒体影响公共政治的趋势^⑤。

陈先红认为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与一般民众在新媒介使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博弈呈现显著变化,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提出了挑战。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时政论坛日益具有公共领域特征,促进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发生下移和反转;其二,网络论坛激发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进而带来新媒体和消息来源的变化;其三,网络论坛改变了传统宣传控制模式,由此带来政府调控新媒体理念和策略的变化^⑥。

在未来的发展中,新媒体面临着公信力较低、版权保护机制不健全、盈利模式不清晰、监管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郑羌认为,由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应用迫在眉睫。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以及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的版权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拥有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保护机制、权利结构等问

① 参见熊澄宇、吕宇翔、张静:《中国新媒体与传媒改革:1978—2008》,《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参见李慎明:《关注新媒体:当前和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参见胡泳:《在互联网上营造公共领域》,《现代传播》2010年第1期。

④ 参见胡茵茵:《网络新闻评论:媒介构建与公共领域生成》,《新闻记者》2010年第4期。

⑤ 参见宋石男:《互联网与公共领域构建》,《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⑥ 参见陈先红:《媒介近用权及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题,已引起国内外版权界以及版权拥有者、版权使用者的高度关注。要做到对内容的有效保护,则需要处理好制作、传输、分发各环节中各参与方的利益分配问题,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和运营机制对上述环节中各参与方的合法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有效的保护。这就要求我们抓住历史机遇,利用科技高速发展所提供的技术手段来创新版权保护机制,为未来各种可能的商业模式和创新性应用提供充分的技术保障,使新媒体实现健康、有序、可控的发展^①。

苏林森认为未来新媒体发展趋势有四点:一是碎片化进一步加强。新媒体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走分众化、专业化、精细化的路子。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竞合进一步加深。三是新媒体越来越普及。新媒体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以博客、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将带来全民传播的时代。四是新媒体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草根阶层更多地利用网络新媒体来表达舆论,广告也越来越投向新媒体。付玉辉认为,未来新媒体将进一步趋于融合、开放、创新,进一步趋于以人为中心的内容的创造、分享以及传播体系的建构和完成。融合不是新媒体发展的唯一趋势,而是这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一种趋势。在融合的平台上,更为重要的是在融合基础之上进行各种基于人性的信息需求的细分和创新^②。

4. 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研究

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2010年新闻界着力工作的重点之一,也是新闻学术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

学者们深刻地分析了中国舆论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新态势,从不同角度探索提升新时期舆论引导能力的新境界。童兵指出,经过30年改革开放,目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从一般层面进入新的核心层面,即从巩固和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等,进入以主权在民、还权于民、充分实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目标的深层次改革。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带来中国舆论格局的巨大变动之一,是亿万民众的多元舆论表达需求的满足在技术层面已无困难。不断开放的传统媒体和神通广大的新兴媒体,也使过去那些限制民众舆论自由表达的方法与手段无能为力。同时,在这种态势下,民众舆论的需求进一步催促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因此,加强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四权”建设是当前拓宽舆论表达渠道的突破口。“四权”中,知情权是社会舆论生成的首要前提,参与权是强化主流舆论场的切实途径,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真正展现,而监督权是前三权的综合运用,是“四权”之要害,也是舆论表达的难点与“高地”^③。

方延明指出,一个相对传统且受到多方面条件限制的新闻舆论,面对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空间,一个在新旧体制转轨中体制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利益问题相互交错的媒体发展与生存环境,必然导致许多不对称和不平衡。因此,必须用新思路、新境界去应对新闻舆论引导的新挑战。作为一种尝试,他提出了舆论引导新境界的构想,即建构一个科学的新闻舆论引导模型,这个模型是由三个层面九个要素组成的亚内核生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外围系统作用于舆论引导的亚内核系统,亚内核系统直接作用于舆论引导的内核决策层,内、外系统互动。通过优化新闻舆论亚内核系统中的理念、制度及实施路径,实现各种积极力量的集约化效应,提高舆论引导的规律意

① 参见郑羌:《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版权保护》,《现代电视技术》2010年第8期。

② 参见金兼斌等:《重新认识新媒体》,《互联网天地》2010年第8期。

③ 参见童兵:《“四权”建设:拓宽舆论表达渠道的突破口》,《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识,依法办事的科学素养,传播价值最大化的效率诉求^①。

钟瑛等学者通过对网络盛行 11 年间 160 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特点与规律的分析,认为:第一,网络舆论事件上升趋势明显,特别是 2008 年以后,网络舆论监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因此,政府对网络舆论的管理任重道远。第二,舆论事件频发点:地域上,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群体上,多集中于接近更多政治、文化、经济资源的群体。第三,舆论事件最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的执政与民生问题。第四,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不仅在网络舆论事件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推进事件圆满解决方面正向作用也十分突出。因此,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媒体,是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②。

丁柏铨对 2009 年网络热点事件进行了传播学解读,认为,这些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模式、传播控制、传播效果等层面对既有传播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传播模式理论有所超越,对“把关人”理论有所突破,对“议程设置”理论有所拓展。网络热点事件体现了传播的去中心化与去权威化特征。他还指出,网络热点事件无论是以“舆论风暴”式的群体性事件的面貌出现,还是以一种规范型公共性实践的理性面貌出现,都能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对于传播途径,网络热点事件的参与者们受到惩罚的风险由于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分散性等诸多特点而大大降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使得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可以成为公民寻找公共资源分配制度改革和利益结构重新调整的重要方式^③。

伴随 3G 技术的成熟发展和普及使用,作为网络传播的进一步延伸,手机在当今民众生活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日趋彰显,尤其是微博传播,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学者重视。手机又被称为“带着体温的媒体”,具有私密、随身的特点。遇到重大问题和事件特别是具有“接近性”的事件和问题,会随时互相告知和提醒,从而形成特定的舆论圈、舆论场,特殊时刻对于舆论的发展起着风向标的作用^④。有学者指出,较之网络,手机传播的主体更加大众化,传播的受众更加广泛化,传播者与受众的界限更加模糊化,信息的接受更加迅捷化。手机网络舆情对于舆情管理的积极效应在于:可提供更加全面、及时、真实的报道,改变信息在政府与民众中占有的不对称,最终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但负面效应也相伴而生,即负向舆论的影响较大,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公众隐私空间大大压缩^⑤。

更多学者聚焦在对微博舆情的引导策略上,其中特别强调“意见领袖”之于微博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识别、培养与引导微博舆论的“意见领袖”是管理微博舆论的最好方式。首先是识别,微博中有两个直观的数字可以成为识别“意见领袖”的标准,一是微博主被关注数,二是微博被转载数。此外,对微博产生的评论,以及数量和内容的关注,也有助于识别“意见领袖”及其掀动的网络舆论。其次是培养,尤其需要注意政府部门的官方微博,微博个性化、私人化、碎片化等特点,可以提高“意见领袖”的亲合力,塑造政府及官员的亲民形象,在网民中培养良好的公信力。再就是引导,主动发现一些草根或是持反对意见的一呼百应的“意见领袖”,加强双向沟通,缓解或消除负面态度。还有学者认为,微博时代对微博舆论主体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① 参见方延明:《论新闻舆论的新境界》,《现代传播》2010 年第 3 期。

② 参见钟瑛、余秀才:《1998—2009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③ 参见丁柏铨、郭舒然:《对 2009 年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学解读》,《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④ 参见杜付贵:《手机时代舆论引导现状和对策研究》,《今传媒》2010 年第 12 期。

⑤ 参见王博:《浅析 3G 时代手机网络舆情的管理》,《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年第 4 期。

阵地意识,疏导一切消极的、狭隘的、非理性的思潮和情绪,要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才华和胆略,建构全球化语境下富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话语体系^①。新媒体格局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独大”的格局,对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提出了挑战。不少学者把关注点放在对新媒体格局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策略方面,提出:“在中国表达自由与社会开放的大环境下,在 Web2.0、全球化语境与中国风险社会环境的语境下,加强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创新具有紧迫性。”^②

朱春阳以电视舆论监督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把电视舆论监督节目作为培育电视舆论引导能力的核心地带进行研究,指出,电视媒体是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媒体之一,既是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又是公众最为有力的利益代言人,集中呈现了媒介与社会民众的关系结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使舆论监督报道成为媒介生产中的常态产品,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有序向现代有序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也是发展中国家媒体必然要承担的责任^③。

范以锦从舆论监督与政治生态环境互动的视角出发,提出:党报、电台、电视等传统强势主流媒体应适应新形势要求,改变“跟随者”的地位,在新媒体时代继续发挥舆论监督引领作用,并提出四点建议:要给传统媒体创造有利于监督的良好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充分利用传统媒体自身办的网站,牢牢掌握“监督”的话语权;在各类传播手段都在传播、说法不一、真假难分时,运用传统媒体的“可信度”发挥作用;以传统媒体善做高度、深度文章及其特殊地位,发挥其权威性的后发优势^④。

也有学者提出,在新媒体格局下主流媒体仍拥有主渠道作用,但在策略上,主流媒体的观念转变、议程设置、引导宗旨的坚持或调整,对舆论引导效果有重要影响。王君超认为,近年来,我国媒介融合已进入“实战”阶段。一些党报锐意推进“全媒体编辑部”、“24 小时滚动编辑部”的建设,完成了从单一的纸媒编辑部向纸媒、网站、音视频终端、网络电视、手机报等复合型、全媒体编辑部转型。在这一新格局中,虽然网络优势十分凸显,但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仍然具有整合其他媒体的优势,继续发挥着舆论引导主渠道的作用。这就要求,主流媒体首先要在观念上,适应“全媒体编辑部”的转变,抢占舆论引导先机。其次要在报道策划、议程设置等方面有新的改革^⑤。

有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语系的舆论监督研究,从舆论监督的话语范式变迁解读意义建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闻思想解读、阐释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的意义。他们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位领导人的反腐思路梳理中,发现非常显著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即不断试错不断发展的变迁过程。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启了来自群众的报纸批评的道路。邓小平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催生了“腐败”概念和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的兴起。江泽民则以“舆论导向”作为大众传媒的首要功能。胡锦涛时期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实施纲要》中,提出了建设“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新思路^⑥。

① 参见宋好:《微博时代“意见领袖”特点探析》,《今传媒》2010 年第 11 期;张月萍:《微博客对网络新闻评论的影响》,《新闻大学》2010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尹韵公等:《新闻评论传播范式的话语转型与构建》,《现代传播》2010 年第 1 期。

③ 参见朱春阳、杨传伟:《电视媒体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电视研究》2010 年第 7 期。

④ 参见范以锦、杨凡:《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现代传播》2010 年第 12 期。

⑤ 参见王君超:《“新媒体格局”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策略》,《新闻与写作》2010 年第 12 期。

⑥ 参见程金福:《四位领导人的反腐思路及其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 年第 1 期。

5. 媒介融合和“三网合一”研究

我国媒介融合研究从2005年开始,2009年以来研究成果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2010年,伴随着媒介融合在国家战略中崭露头角,全媒体、“三网融合”等业界的实践增多,媒介融合研究更加细致具体,理论上也不乏敏锐的反思。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使传统传媒产业之间的边界从清晰变为模糊,这些变化推动传媒、电信、出版、娱乐、信息、文化等产业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并在全球形成了大规模的并购、重组和融合浪潮。肖叶飞认为媒介融合将引领产业链向横向延伸和纵向拓展,引领传媒产业从资源整合到产业重组,引领传媒产业与电信、文化产业融合^①。但对于媒介融合,除了憧憬也有反思。张立伟从以往的融合案例中进行分析,指出新媒体的本质是小众媒体,而现在的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与新媒体的小众化格格不入,在最根本的内容生产体制上就无法融合。媒介组织机构融合,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就办不到;更好的选择是趋异、分化、分工,在服务大众与小众之间,打造各自的核心竞争力^②。陈国权分析了几例媒介融合的个案后,认为形态的融合、所有权的合并、组织机构的融合等步履维艰,败局连连,而战术性联合倒是“硕果累累”,但是“全媒体记者”违背现代生产专业分工原则,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他认为受众注意力分化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分化的媒介产品,不可能是融合产品^③。针对陈的观点,有学者与之商榷,试图从技术变革的宏观趋势、发达国家的媒介融合实践、受众注意力的转移、媒体对新闻报道质量的追求以及Web2.0长尾效应等方面,阐明实质为“跨平台发布”的媒介融合是媒介集团发展的必然趋势^④。

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更多的学者从关注媒介融合转而研究作为社会变化之一种,媒介融合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于婷婷、窦光华从信息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媒介融合,认为对媒介环境的日益依赖将使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习惯了虚拟生存的人们将加深与现实社会环境的隔离与矛盾。这种环境的失调不但影响人类自身健康的个性与人格的形成,还会阻碍人类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肖芃、蔡骥从社会变迁和社会互动的视角,梳理媒介融合进程中技术、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等相互交织的脉络,思考科技变革和经济变迁是如何促进大众传播的受众、产品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这些变化又如何孕育了具有多元化、多重性的现代传媒新纪元^⑤。他们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既是一场传媒产业的深度变革,也是一次引人注目的社会变迁,中国语境决定了中国媒介融合的渐进式进程。媒介融合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标志性景观。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要素作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往往会带来比西方国家更为强大与更为快速的后发优势。

学者们还就媒介融合条件下新闻怎么做,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如何改革,媒介融合中传统媒体如何生存和转型,新闻生产组织如何调整,新闻教育如何跟进,经营管理如何加强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① 参见肖叶飞:《媒介融合引领传媒产业变革》,《中州学刊》2010年第6期。

② 参见张立伟:《媒介融合:犹如带橡皮的铅笔》,《新闻记者》2010年第8期。

③ 参见陈国权:《哪些不能融合——媒介融合的分类与实现方式》,《中国报业》2010年第8期;《市场机制比融合更重要——以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反思媒介融合兼谈媒介分化的意义》,《新闻记者》2010年第12期。

④ 参见邓建国:《媒介融合:受众注意力分化的解决之道——兼与“反媒介融合论”商榷》,《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

⑤ 参见于婷婷、窦光华:《信息社会学视角下的媒介融合》,《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肖芃、蔡骥:《媒介融合:变迁的旋律》,《求索》2010年第10期;蔡骥、肖芃:《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